

中国古代编辑史论稿

靳青万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6239.29133112
95-16

中国古代编辑史论稿

靳青万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豫)新登字第09号.

中国古代编辑史论稿

靳青万 著

责任编辑 路 石

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开封市明伦街85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河南省中牟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6.25 插页:6 字数:119千字

1992年1月第1版 1992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定价:6.80元

ISBN 7—81018—713—9/K·83

内 容 提 要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文化发展没有中断的国家,她的文化典籍是全世界最多的,她的编辑历史是全世界最长的。然而,对中国编辑史的研究却几乎一直是一项空白。本书采用以论带史、史论结合的方法,从中国编辑的萌芽、形成、发展、繁荣等五大方面,对中国古代编辑史作了较为系统的论述,从而详略得体地勾画出了一部中国古代编辑史的轮廓。其中对编辑的定义、编辑的起源、编辑的形成,以及古今编辑的异同等方面的考论均不乏独到见解。特别是书中所提出的“编辑的产生先于文字,距今已有一万年左右的历史”的观点,尤为国内外所仅见。

DAOS/05

靳青万，男，1953年6月生，河南省内乡县
人。1970年初中毕业后回
乡务农，并从事文学创作
和音乐创作，笔耕于故乡
葫芦山下。1974年起任中
学教师。1978年考入许昌
师专中文系，1981年毕业
后，留校创办并主持《许
昌师专学报》至今。1987年



带职赴河南大学编辑学研究生班就读，1989年毕业。现任中
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理事、河南省出版工作者协会期刊分
会理事、河南省高校学报研究会副秘书长、许昌师专学报编
辑部主任、主编。其主要论著有：《金瓶梅作者新探》、《编
辑的产生与发展——世界编辑史论纲》、《论中国古代的两大
发明与编辑活动之关系》、《也谈编辑学理论体系的建立》、
《学术刊物在经济建设中的巨大作用不可忽视》、《试论高
校学报的社会性与社会效益》、《后汉书选注》（合著）
《花鸟诗鉴赏辞典》（合编）、《中州历史人物辞典》
（合编）、《历代争雄记》（合著）、《孙奇逢传论》等。

目 次

一、导 论	(1)
(一) 关于编辑定义的问题	(2)
(二) 关于古今编辑差异的问题	(5)
(三) 关于如何追溯编史源头的问题	(7)
(四) 需要说明的其它几个问题	(13)
二、中国编辑的萌芽时期 (上古至商)	(16)
(一) 从远古的造符运动到文字的产生	(16)
(二) 编辑在远古人类的造符运动中产生 并对文字的形成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1)
(三) 上古时期可考知其姓名的 几位编辑人物	(26)
三、中国编辑的形成时期 (殷至春秋, 约当前1398~前476年)	(34)
(一) 文字编辑的形成	(35)
(二) 文献书籍编辑的形成	(36)
(三) 中国古代杰出的编辑家——孔子	(49)

四、中国编辑的发展时期（战国至隋，

- 前475~617年）……………（56）
- （一）字书、辞书编辑的发展及其成就……………（57）
- （二）一般书籍编辑的发展及其成就……………（61）
- （三）目录编辑的发展及其成就……………（81）
- （四）编辑职业的形成与官方
编辑机构的设立……………（90）
- （五）纸的发明和使用对编辑活动的影响……………（92）

五、中国古代编辑的繁荣时期（唐至清，

- 618~1840年）……………（95）
- （一）印刷术的发明和应用
对编辑活动的影响……………（96）
- （二）官方编辑机构的设置及私营编辑业的
进一步发展……………（99）
- （三）字书、辞书、韵书等小学类书籍
编辑的繁荣及其成就……………（102）
- （四）历史类书籍编辑的繁荣及其成就……………（112）
- （五）文学类书籍编辑的繁荣及其成就……………（124）
- （六）类书编辑的繁荣及其成就……………（129）
- （七）丛书编辑的繁荣及其成就……………（133）
- （八）目录编辑的繁荣及其成就……………（140）
- （九）其它各类书籍编辑的繁荣及其成就……………（144）

附 录

(一) 编辑的产生与发展	
——世界编辑史论纲·····	(147)
(二) 中国古代的两大发明与编辑活动之关系··	(172)
(三) 也谈编辑学理论体系的建立·····	(187)
后 记·····	(193)

一、导 论

人类历史的车轮，已驶入20世纪的最后一个10年。人类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无论从其颠峰还是就其积淀来讲，都已达到了令人惊叹的程度。这是全人类前赴后继，世代奋斗共同创造的结果。掀开历史，人类、无论是“英雄”还是“人民”，他们抗争奋斗的足迹印遍了节节段段，不朽的功绩载满了章章页页……

然而，有一种劳动者的功业，千百年来却一直处于一种若明还暗、欲寻难见的隐没状态。编辑活动，作为人类文化创造活动中的关键性的活动，编辑，作为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创造活动的重要参与者，在迄今以前的一切史书中却几乎都没有明确的记载，更谈不上有他们所应有的席位。他们，真地成了人们所说的“无名英雄”。

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并且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的一个文化发展没有中断的国家。它的文献典籍是全世界最多的，它的编辑历史是全世界最长的、编辑成就也是全世界最大的，它对于整个人类文明史的贡献是举世公认的，不可磨灭的。可是，她也一直没有一部自己的《编辑史》，她的编辑历史也同样处在隐没状态之中。

今天，我们不能让这一隐没着的历史再“隐没”下去，我们应通过渐进的、深入的研究和发掘，来努力昭揭这一历

史，竖起这座早就该竖起的历史丰碑，以便激励后人，同时从中总结其历史经验，探索其发展规律，为我们今天和今后更好地发展人类的编辑文化事业而奋斗。这就是我们治编辑史的初衷之所在。

研究中国古代编辑史，必须首先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一）关于编辑定义的问题

不解决编辑定义的问题，编辑史的研究就无法开始。什么是编辑？中国的《现代汉语词典》认为：编辑一是“对资料或现成的作品进行整理、加工”；二是“指做编辑工作的人”。

中国的《辞海》的解释是：编辑一是“指新闻出版机构从事组织、审读、编选、加工整理稿件等工作。是定稿付印前的重要环节”；二是“指从事编辑工作的人员”。

中国的《辞源》释其为：“收集材料、整理成书。”

中国台湾的《中文大辞典》释其为：“搜辑材料以编成书报。”

美国的《韦氏新世界》词典释其为：“通过选择、整理、加注释，使作品、日记、书信等适于出版。”

美国的《作家词典》认为：“编辑是生产、编选和修订文字材料、摄影材料和视听材料，使其适于出版的艺术。”

英国的《牛津词典简编本》认为：编辑是“加工、整理（文字材料）以供出版。”

日本的《出版事典》的解释为：“按照在一定的编辑方针指导下制订的编辑计划，以作品原稿为工作对象，进行创造性的整理编排，使之形成出版物的形态，这种具有学识性的、技术性的工作称为编辑。”

朝鲜的《朝鲜语小词典》的解释是：“为刊行出版物而对原稿进行审读、修正和整理。”

苏联的《图书学词典》释其为：“出版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内容是编辑人员（通常是同作者在一起）对原稿进行创造性加工，目的在于提高其思想、政治、科学和文字质量，为印制出版作准备”。

原民主德国的《迈尔新百科词典》释为：“加工稿件以供出版。”

南斯拉夫的《大众百科词典》释其为：“加工、润色、整理、修正，为出版作准备。”

如此等等，释义纷呈，缺乏一致的看法。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意林穗芳先生的观点：“‘编辑’这个概念是发展变化的，在古代和现代，其内涵和外延不完全相同。”^①以上对“编辑”一词所下的诸多定义，除“指从事编辑工作的人”这一方面无可争议以外，其余在指“工作”方面的释义都

①林穗芳《关于编辑学的性质和研究对象》，见《编辑学论集》中国书籍出版社1987年10月第1版，第211～425页。

明显地属于现当代的概念，而却无法包容古时候尤其是刚萌芽时期的编辑的含义。林穗芳先生看到了各家释义的混乱现象，试图解决这一矛盾，提出了一个新的释义方案：编辑是“收集和 research 有关出版的信息，按照一定的方针制定并组织著译力量实现选题计划，审读、评价、选择、加工、整理稿件或其他材料，增添必要的辅文，同译著者和其他有关人员一起通力协作，从内容，形式和技术各方面使其适于出版，并在出版前后向读者宣传介绍。”可惜，林先生的这个释义方案不仅更加现代化了，而且将其内涵和外延缩得更小，小得仅能适用于现代的书籍出版社，而却将其他如报刊、声象、图书目录以及延续了数千年的古代编辑一概排除在外了。

上面所列国外的几种释义过于现代化，无法包容在出版业出现之前的古代辑编活动，这一弊端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国内的尤其是与古籍联系紧密的《辞源》和《中文大辞典》的释义又怎么样呢？我们认为也同样是不完善的。为什么呢？因为，先就《辞源》来说，它对“编辑”的释义是“收集材料，整理成书”，那么，对在“书籍”出现以前的编辑活动又怎么看待呢（据本书的研究结果，在书籍出现以前很早便已有了编辑活动，此点将于后面详论）？再就《中文大辞典》来讲，它的释义为“搜集材料以编成书报”，同样把“书报”出现以前的编辑活动排除在编辑之外了。因而，这两种定义也是不完善的。

基于我们对上述诸多释义无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憾的看法，在反复推敲、长期揣摩的基础上，著者曾于1988年两度提出过一个关于编辑的定义：“编辑活动是对人类精神文明文化创造活动中的初级产品进行收集、鉴别、选择、加工、改造、整理、提高、排列、组合、规范、定型等一系列再创造，使之优化成为高级产品的实践活动，是人类精神文化生产活动中的关键环节，在整个人类精神文化大厦的构建中，她起着建筑设计师和高级工匠的作用。”^①这个定义，偏重于从大处着眼，抓住了古今各门类编辑的最为普遍的、共同的特征，注重释明其本质上的涵义，涵盖面较广，适用于古今各种门类的编辑活动，因而笔者至今仍以为这个定义是较为适当的。

（二）关于古今编辑差异的问题

编辑活动也是一项由低级向中、高级不断发展、进化、变异并日益繁冗复杂的活动。古代的编辑，由于当时的客观历史条件，从其工作的性质到工作的对象、程序、结果等方面均与现当代的编辑有着很大的差异，这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因而绝不能拿我们今天的编辑特征与要素去套古代的

^①见拙文《编辑的产生和发展——世界编辑史论纲》载《河南大学学报》（哲社版）1988年编辑学研究生论文专辑，和《论中国古代的两大发明与编辑活动之关系》，载《许昌师专学报》（社科版）1988年第4期。

编辑。在这个问题上应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有的同仁机械地以今天的编辑标准去套古代的编辑，结果得出了“古代无编辑”的结论，这是不客观、不正确的。试问，如果采用这种逻辑，拿今天人类的衣食住行等特征去要求古人的话，那么显然古代的人与今天的人也存在着极大的差异，难道能就此得出结论，说“古代无人”吗？显然是不能的。事实上，不仅是古代与现当代的编辑具有很大的差异，就是在古代或现当代的不同发展时期，其编辑的内涵和外延也是具有很大不同的。如甲骨文献时期的编辑和布帛简册时期的编辑，从工作对象、工作方法、形式到工作内容和结果都是大不相同的；抄本写本时期的编辑和刻版印本时期的编辑情况也是不相同的；编著合一时期和编辑成为一门专门的社会职业时期的编辑的情况更是不相同的。展望未来，再过百千年，那时候的编辑和我们今天的编辑又肯定会有绝大的差异。我们应当尊重和承认这种历史发展的客观事实，而不能简单地用今天的标准去套它们，以致于得出象“古代无编辑”那样的错误结论。

在我国漫长的编辑发展史上，曾经较长时间地存在过“编著合一”的现象，也就是编辑者和著作者同为一人的。如曹植和李贺都是亲自将自己的作品加以编辑整理编定成集子的。古代这种现象是很多的。有同志不承认这里面具有编辑性质的劳动，不承认有“编著合一”的现象，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我们认为这种定型产品里面包含了两种类型的劳

动，即著作型的劳动和编辑型的劳动，在编定成书的过程中融进了大量的鉴审、选择、删削、修改、加工、编次、校订、整理、定型等工作，难道这不正是编辑性质的劳动吗？只不过这种本应属于编辑的工作改由作者一人代劳罢了。所以，“编著合一”是确实存在过的历史现象。

事实上，在我国古代人的心目中，编辑、编次、编校、编修、编述、编订、编削、编著、编撰、编纂等概念的主要内涵都是相近或相同的。如《辞源》这一重在“溯源”的工具书，就将“编辑”释为“收集材料，整理成书”，若按照今天的理解，这个释义只能是“编纂”或“编撰”、“编著”的意思，而绝不能是“编辑”，这说明古人是将其视为一类的；而台湾的《中文大辞典》对于“编纂”条的释义也恰恰正是“编辑也”。我们研究古代编辑史，一定不能忽视这种特殊的现象。

（三）关于如何追溯编辑史源头的问题

中国的编辑史源远流长。到底哪里才是中国编辑史的源头？迄今以前治编辑史的同志均认为应从文字产生以后算起，因为他们认为只有在先有了文字以后才能有编辑。我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因为它不符合编辑产生时的实际情况。客观的历史事实则是，编辑在文字正式形成之前、即在文字的萌芽及其演化形成过程中便已经产生了。

我们知道，文字的产生并非一蹴而就的事，它是一项极其浩大的工程，经过了一个极其漫长的历史演化过程。我们认为，正是编辑在这个形成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通过对人类文化学、历史考古学、文字学、民俗学、符号学等方面有关内容的考察后我们发现，在人类的远古时代曾有过一个广泛、普遍而又持久的符号文化创造时期。这个造符运动是出于人类对生产、生活中各种信息的记忆、交流、传递、储存等方面的需要而自发产生的。起初，人们只是利用一些天然符号，山林树木、日月星辰等，都可被借以作为所用的符号。正如苏联学者V. A. Istrin（依斯纯）所说：

“起初，原始人类开始懂得，他们周围的各种现实、现象，都是‘假定符号’。比方，树林里发现的足迹或者被踏坏了的树枝就是有人或野兽来过的符号，篝火的灰堆是有人停留过的符号，等等。”①他并且认为：“学会认识这些符号，显然，在旧石器最后一次冰河时代已经特别发达了。”②后来又发展到自己创造符号。原始先民创造符号的方法，一是直接取自于自然符号，正如许慎《说文解字序》中所说的“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迹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这段话道出了原始先民们初造符

①②〔苏〕V. A. 依斯纯著《文字的发展》，杜松寿译，文字改革出版社1966年3月第1版，第64页。

号时的情况。近人胡奇光先生在其《中国小学史》中也说：

“段玉裁说的‘见远知兔，见速知鹿’，是本于《尔雅·释兽》：鹿‘其迹速’，兔‘其迹远’，大约处于茹毛饮血时代的先民，善于从走兽的足印来识别走兽的类别，这残留在文字上，是兽足义与分辨义相通。《说文》‘采’（審）‘悉’‘释’均从‘采’，‘番’（兽足）也从‘采’。

‘采’读若‘辨’。《说文》解释说：‘采，辨别也，象兽指爪分别也。’段玉裁引《说文序》的话来解释：‘仓颉见鸟兽蹄迹之迹，知文理之可相别异也，遂造书契。采字取兽指爪分别之形。’先民与鸟兽为伍，或者捕兽着而得食，或者被凶兽猛兽所杀，二者必居其一。在这严酷的生存斗争中，他们逐步学会辨别鸟兽足印的本领。对他们来说，鸟兽足印就是传达信息的符号：凶兽未到，即已逃避，食兽才过，就去追捕。如把这走兽足印的特点描画下来，转告他人，那就成了记事的图画。”①胡先生的这段话也精辟地说明了原始人类创造符号的情况，并且指出了文字的另一个源头——原始图画符号发端的缘由。

本书研究的结果认为：在远古的造符运动中，先民们创造符号的方法及类型主要有三大部类，一是刻划符号，二是图画符号，三是结绳符号。前两者构成了后世文字的两大源头。

①胡奇光《中国小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版，第18页。